

黄河盟津与中国古代关津

陈习刚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2)

摘要:黄河“盟津”原称“孟津”,为夏代古国孟国在黄河上的重要津渡,因国得名,自周武王在孟津“会盟”诸侯讨伐商纣后,多称作“盟津”。盟津是中国最古老的关津之一,盟津的演变在军事史、交通史、舟桥建造史尤其是关津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反映出中国古代关津的发展演变历程与特征,具有典型代表性,是中国古代关津的缩影,也是中国关津史上和黄河文化中声名最为显赫、影响最为深远的关防军政重镇。

关键词:孟津;盟津;河阳;地望;历史演变;地位

中图分类号: K928.6

DOI: 10.3969/j.issn.1672-9846.2021.03.001

文章编号: 1672-9846-(2021)03-0001-19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黄河是中国的母亲河,黄河上关津数十上百,关津文化是黄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关津是关防之地,置于要道险隘处,是历朝统治为控制人民和防止外部侵扰而创建的。“津”,《说文·水部》:“水渡也”^{[1]233}。本义为渡口,引申为水路冲要之处,常与关并称为“津关”“关津”。元人胡三省说“关,往来必由之要处;津,济渡必由之要处。”^{[2]卷二六六,2936}关津处于水陆要冲,控扼重要交通线路,在边塞和战争之时,又是军事要地,有着军事上的守备防务之责。盟津是黄河上重要关津之一。盟津为西周武王讨伐商纣北渡黄河两会诸侯之地。“盟津”原称“孟津”,为夏代古国孟国之津,自周武王盟诸侯于孟津后,又主要以“盟津”称名。后曾称孟津戍、富平津、陶渚、河阳津、河阳关、河阳三城等。其地望因黄河变迁而有所移徙。

盟津是中国最古老的关津之一,在军事史、交通史、建筑史尤其是关津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反映出中国古代关津的发展演变历程与特征,具有代表性,是中国古代关津的缩影,是黄河关津文化的核心。以下在前贤今彦的研究基础上^①,主要就盟津的名称、演变、地望、历史地位等问题

再作讨论,不当之处,祈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盟津名称的由来

盟津的名称,学者有不同的观点。这实际上涉及两个问题,一是盟津是否为最初名称,二是盟津的得名。若盟津是最初的名称,那得名什么?若盟津并非最初名称,那就是原名称更名,原名称得名是什么,更名又是依据什么?盟津的名称有四种观点,但主要有两种观点。

一是盟津的原名为孟津。

盟津的名称,最初的观点是为孟津,就是说盟津源于孟津,孟津在先,孟津是盟津的前名。这种观点出现于战国时期,其依据有《尚书·禹贡》:“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南至于华阴,东至于底柱,又东至于孟津,东过洛纳至于大伾。”^{[3]29}《尚书·禹贡》作于战国中期。东晋梅賾所献孔安国(西汉人)传《古文尚书》(伪孔传、伪传)说“孟津,地名。”此见唐人李贤注《后汉书》卷一上《光武帝纪上》更始二年(公元24)所载光武帝令冯异守孟津之事(详下)。唐孔颖达疏云“孟是地名,津是渡处,在孟地致津,谓之孟津。《传》(指孔安国传)云‘地名’,谓孟是地名耳。”可见,战国时期有孟

收稿日期: 2021-07-07

作者简介: 陈习刚(1966-),男,湖北黄冈人,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从事葡萄文化史、出土文献、关津史、隋唐五代史、河南地方史等研究。

津之名了。也说明西汉有孟津之名,孔安国指出了得名之因,是因地名得名。

《史记》卷二九《河渠书》载有“孟津”一名:“故导河自积石历龙门,南到华阴,东下砥柱,及孟津、雒纳,至于大伾。”^[4]¹⁴⁰⁵ 不过,王树民认为《史记·夏本纪》《史记·殷本纪》《史记·周本纪》和《汉书·地理志》《汉书·沟洫志》都作“盟津”,怀疑此处是后人忘改所致^[5]。

《后汉书》卷一上《光武帝纪上》更始二年载:“青犊、赤眉贼入函谷关,攻更始。光武乃遣邓禹率六裨将引兵而西,以乘更始、赤眉之乱。时更始使大司马朱鲋、舞阴王李轶等屯洛阳,光武亦令冯异守孟津以拒之。”原注“孔安国注《尚书》云:‘孟,地名,在洛北,都道所凑,古今以为津。’《论衡》曰‘武王伐纣,八百诸侯同于此盟,故曰盟津。’俗名治戍津,今河阳县津也。”^[6]¹⁸ 《后汉书》纪传部分是唐高宗的儿子章怀太子李贤注的,重点是解释文字,但也参考其他东汉史书;对史实有所补正,为各志作注的是南朝梁刘昭,他的注侧重说明或补订史实。孔安国为西汉人,王充为东汉人。伪孔传虽是伪作,但包含其中的《今文尚书》篇章并非伪书。据孔安国所注,西汉时有孟津一名,“古今以为津”,因地得名,但没有说出什么时候出现这一名称。《淮南子·览冥篇》也载有孟津之名“武王伐纣,渡于孟津,阳侯之波,逆流而击,疾风晦冥,……于是风济而波罢。”^[7]³²⁹ 依《后汉书》所载,东汉也是有提孟津这一观点。

东汉还提出了孟津得名的原因和出现的时代。《论衡校释》中《附编一·论衡佚文》载“武王伐纣,升舟,……中流,白鱼入于舟。燔以告天,与八百诸侯咸同此盟。《尚书》所谓‘不谋同辞’也。故曰孟津,亦曰盟津。《尚书》所谓‘东至于孟津’者也。”原注“《水经注·河水注》卷五。《后汉书·明帝纪》^②注引作‘武王伐纣,八百诸侯同于此盟,故曰盟津’。按《感虚篇》文略同。”^[8]¹²¹⁴ 《感虚篇》也是王充作品。《论衡》卷五《感虚篇》:“武王伐纣,渡孟津”,“武王渡孟津时,士众喜乐,前歌后舞,天人同应”^[8]²²⁹。这里说孟津、盟津名称同时出现,其得名原因都是一样的原因。但说明东汉人有支持孟津一名提法,并认为孟津得名“不谋同辞”,因事件得名,时代在商代。不过,我们注意到王充并没有指出孟津、盟津之前的名称。

魏晋南北朝时,有孟津之名。《史记》卷二《夏本纪》:“道河积石,至于龙门,南至华阴,东至砥柱,又东至于盟津。”唐司马贞《索隐》:“孟津在河阳。(北魏阚骠)《十三州记》云‘河阳县在河上,即孟津’是也。”^[4]⁷⁰⁻⁷² 《监本附音春秋谷梁注疏》卷二隐公八年(前715)载“盟诅不及三王。”东晋范宁(339—401)集解“三王,谓夏、殷、周也。夏后有钧台之享,商汤有景亳之命,周武有盟津之会。众所归信,不盟诅也。……盟津音孟,本亦作孟。”^[9]²³⁷¹ 从晋人注音来说,也表明“孟”在“盟”前。

唐人明确指出盟津原名孟津,盟津因音同而来。如前引《史记·夏本纪》:“道河积石,……又东至于盟津。”唐司马贞《索隐》:“盟,古‘孟’字。孟津在河阳。”^[4]⁷⁰⁻⁷² 这里,也是说盟津原为孟津,孟、盟为古今字。

今人也有认同这一观点。如易健贤认为孟津是“黄河古渡口,在今河南省孟津县东北,孟县西南。史载周武王讨伐商纣,曾在此与诸侯盟约,故又称盟津”^[10]^{卷二,450}。还有学者进一步推测孟津是夏代古国孟国之津,因周武王盟诸侯于此而更名盟津,将“孟”具体确定为“孟国”。周天游认为,孟国就是夏代孟涂氏封国,孟津县“地处古都洛阳北近郊,黄河南岸。夏为孟涂氏封国,商为内畿地,周朝称邑,秦代设县”^[11]¹²⁶。马世之指出,夏代古国“孟国的地域在孟县境内,孟县即今河南省孟州市,古称河阳,唐会昌三年(843)置孟州,明洪武十年(1377)废州为县,1996年撤县设市。……‘孟津’之名,大约就是孟国之津的意思”,并引《孟津史话》说“自周武王盟诸侯于孟津后,史家易‘孟’为‘盟’,将‘孟津’改名为‘盟津’。”^[12]²⁶ 就是说,盟津初名孟津,是夏代古国孟国的津渡,得名于孟国,因国得名。《尚书·禹贡》中的“孟”指“孟国”,孟津就是孟国黄河上的津渡。

二是孟津的原名为盟津。

说盟津在先,历代文献上也有记载。据战国《尉繚子》,盟津在商代就有。《尉繚子·武议》:“太公望年七十,屠牛朝歌,卖食盟津,过七十余而主不听,人人谓之狂夫也。……武王伐纣,师渡盟津,右旄左钺,死士三百,战士三万;纣之陈亿万,飞廉、恶来身先戟斧,陈开百里。武王不罢士民,兵不血刃而(克)商诛纣,无祥异也,人事修不修而然

也。”^{[13] 36-37}姜太公在遇见周文王前,曾在盟津一带贩卖食物,就是说商代就已经有盟津,而且是一个重要的津渡。这样,盟津就不是得名于武王伐纣盟诸侯之事了,与八百诸侯会盟事件无关。

西汉人也提盟津。据《史记》所载,商代已经有盟津。如《史记》卷三《殷本纪》:“西伯既卒,周武王之东伐,至盟津,诸侯叛殷会周者八百。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尔未知天命。’乃复归。”^{[4] 108}又同书卷四《殷本纪》:

九年,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于盟津。……武王渡河,中流,白鱼跃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是时,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还师归。居二年,……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盟津,诸侯咸会。曰:“孳孳无怠!”武王乃作太誓,告于众庶……^{[4] 120-122}。

《正义》:“毕,尽也。尽从河南渡河北。”就《史记》所载,武王预征商纣时,盟津在商代就存在,“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也说明盟津不是因武王伐纣之盟事件而得名。也表明西汉时人有盟津之称。又如前引《史记·夏本纪》所云“又东至于盟津”。这说明夏禹之时就有盟津之名。《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载“道河积石,至于龙门,南至于华阴,东至于底柱,又东至于盟津。”^{[14] 1534}也是作盟津之名。东汉时,也有盟津的观点。如上所引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光武帝纪上》更始二年(公元24)记载及所注东汉人王充《论衡》及《论衡校释》中《附编一·论衡佚文》。

魏晋南北朝时,仍然有盟津观点。如《水经注》卷五《河水》:“又东过平县北,湛水从北来注之。”注云“河水于斯,有盟津之目。”^{[15] 107}

唐人也有认为,先有盟津,后有孟津,孟津源于盟津。前引《汉书·地理志上》所载“道河积石,……又东至于盟津”,唐人颜师古曰“盟,读曰孟。孟津在洛阳之北,都道所凑,故号孟津。孟,长大也。”就是说,孟津因盟津而来。孟津的得名有两种原因:一是因与盟津读音相同而来,二是因“都道所凑”而来,即读音与内涵是孟津得名的由来。前引《后汉书·光武帝纪》唐人李贤注引有“武王伐纣,八百诸侯同于此盟,故曰盟津”,也说明唐代仍然有盟津观点^{[6] 18}。

民国时期,王树民指出,“盟津原为河之大津,因有此大事,后世遂以事名其地焉。然则本字当作‘盟津’,其作‘孟津’者,同声假借也。”^[5]童书业亦认同这种观点,只是对“孟津”得名未作说明^[16]。

今人牛汝辰认为,“孟津原名‘盟津’,是古代洛阳东北黄河上的重要渡口,是以周武王伐纣在此与诸侯歃血为盟命名的;孟为盟的谐音,金代在孟津渡南口置孟津县。”^{[17] 98}

三是孟津、盟津名称同时出现。

在前两种观点之外,其实还有一种观点,就是孟津与盟津的名称同时出现的,没有先后之分。这种看法出现在东汉。

据上所引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光武帝纪上》更始二年(公元24)记载及所注东汉人王充《论衡》及《论衡校释》中《附编一·论衡佚文》,《论衡》既提及盟津,也提及孟津。并认为孟津得名“不谋同辞”,因事件得名,时代在商代。孟津、盟津同时并提,又是一种观点。但王充没有提及此津之前的名称。

四是盟津、孟津并非同一地名名称的先后。

吴郁芳曾提出盟津地理位置在风陵渡而不是在孟津说^[18]。虽然是就盟津地望的探讨,但从另一角度看,反映出了一种新观点,就是孟津、盟津是两个不同名称,代表着两个不同地方,孟津、盟津不是一个地方名称的先后名称。不过,在这种情况下,两个名称的先后仍包括在前面三种情况之内。

由前所述,关于盟津名称的出现时代、得名原因及与孟津之关系等都存在不同的观点。那么到底哪一种观点更为合理或更接近历史的真相呢?

暂且不论盟津一名什么时候出现,但作为当时黄河南北的一大渡口存在于夏商时代,应该毋庸置疑。既然是一个重要交通渡口,应该有一个名称或称呼,不可能仅仅以渡口的泛称“津”来称呼。这样,这个渡口的存在就与商末周武王在此津会盟八百诸侯之事件无关。即使有关,也仅仅与改名有关,至多是“盟津”一名的来源。前引先秦文献,无论是《尚书·禹贡》还是《尉繚子》,虽然提及孟津、盟津,但这两个名称来历都与武王伐纣之盟事件无关,它们在夏商时代已经存在。《史记》《汉书》所载也是证明。《逸周书·商誓篇》载“昔我盟津,帝休,辨商其有何国。”《逸周

书》成于汉代,但有学者认为其《商誓篇》为西周作品,以此认为“孟津”原为“盟津”之铁证^[16]。此处“盟”为动词不错,但不足以反映“孟津”与“盟津”间关系。即使说此为后人将此盟于津的“盟津”误为地名“盟津”原因,这至多说明“盟津”一名的可能来由,但仍然无法知道此津渡的原名是什么。再说,盟誓之事,也有不同说法。如前引《监本附音春秋谷梁注疏》卷二隐公八年(前715)所载“盟诅不及三王”,东晋范宁(339—401)所注“周武有盟津之会。众所归信,不盟诅也”,“众所归信,不盟诅也”,是说当时周武王与诸侯的合聚并不是因会盟立誓,而是民心的归顺。

据前引周天游、马世之所论,夏代有古国孟国,此后来称之为“盟津”的大渡口就在孟国境内,因此,称此津为“孟津”,因国为名。古国孟国的存在是事实,但问题在于此孟国到底在哪?此津是否在孟国范围之内?《附释音春秋左传注疏》卷四隐六年(前717)载“君子谓郑庄公失政刑矣。……王取郟、刘、蔿、邾之田于郑,而与郑人苏忿生之田:温、原、緄、樊、隰郟、欃茅、向、盟、州、陘、隰、怀。”西晋杜预注“凡十二邑,皆苏忿生之田。欃茅、隰属汲郡。余皆属河内”;“盟”,“今盟津,盟音孟”^[19]1736-1737。此盟邑在河内,盟津也是在河内,两地应该相关。我们认为,在孟国时的孟津,因孟国为名,后来又写作盟津,正如唐人司马贞所言,孟、盟为古今字,因为“孟”字今字“盟”的出现,“孟津”也写作“盟津”,这正是夏商时代、先秦文献中孟津、盟津都见记载的原因。如《史记》卷四《周本纪》正义引《尚书·太誓篇》:“惟十有三年春,大会于孟津。”^[4]120童书业认为这是今《伪泰誓》所载,汉初之书逸《伪泰誓》所载则为“盟津”^[16]。但今文尚书是可信的先秦文献,而古文尚书则是魏晋时期人造的伪书。这样,今《伪泰誓》所载还更可信。周武王伐纣会盟诸侯于孟津后,就更多地以“盟津”称名。孟国灭亡后,在盟津附近又兴起了“盟”邑,因“盟津”为名。

二、盟津的演变

从上述历代所出现的有关盟津观点的讨论,也可以看出盟津名称演变情况一斑。当然,实际情况比这更复杂一些。盟津的发展演变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 夏代至汉末的交通要冲

夏代,因孟国,黄河渡口出现孟津一名。随

后,因古今字原因,出现盟津写法。这两种写法一直延续到商末周武王伐纣事件发生时。此后,孟津多以盟津为名。盟津作为津渡的同时,也是当时的市集地,如前引战国《尉繚子》所载,太公望曾卖食盟津。

孟国灭亡后,在“盟津”已经兴起“盟”邑,实际上就是集镇。如前引《监本附音春秋谷梁注疏》卷二所载,有“盟”之称。盟当因盟津得名,在盟津北渡口。《读史方輿纪要》卷四九《河南四》“孟县”条“周武王会诸侯于孟津,是也。亦曰盟津。《左传》隐十一年(前712):‘王以盟与郑。’后属晋,为河阳。战国属魏,为垣雍地^③。汉为河阳县,属河内郡,高祖封陈滑为侯国。”^[20]2298同书同卷孟县“河阳城”条“旧城在今县西南三十里。春秋时晋之河阳邑,僖二十年(前640)‘天王狩于河阳’是也。后属魏。《史记》:‘赵惠文王十一年(前288),董叔与魏氏伐宋,得河阳于魏。’汉置县。”^[20]2298僖二十年(前640)当为僖二十八年(前632)(详后)。“得河阳于魏”句见于《史记》卷四三《赵世家》所载^[4]1816。但《太平寰宇记》卷五二《河北道一》孟州载“河阳郡……在周为畿内苏忿生之邑,后为晋邑。……后属魏,魏哀王(前318—前296年在位)改为河雍。至汉又为河阳县,魏、晋同之,属河内郡。后入后汉刘聪、后秦姚宏亦如之。”^[21]436这里说盟地为王畿,未曾给郑国,后为晋国所得,战国魏时河阳邑已经改为河雍了。温原为周初苏忿生的封邑。王丰也指出盟邑由王畿成为晋国之地“春秋初,周桓王曾一度把它换给郑国,只是苏氏不听命,所以仍属王畿之地。周襄王又赐给了晋国,为晋南阳地。”^[22]当时与郑的包括温邑、盟邑等在内的十二邑,应该都没有给郑国。

《史记》卷五《秦本纪》载:秦昭襄王十七年(前290)“王之宜阳”,十八年(前289)“司马错攻垣、河雍,决桥取之”。《集解》:“(东晋)徐广曰《汲冢纪年》云魏哀王二十四年(前295),改宜阳曰河雍,改向曰高平。”^[4]212-215这是说河雍县又源自宜阳。据《史记》卷五《秦本纪》载,秦武王四年(前307),取韩宜阳^[4]209。公元前307年,宜阳已经属秦,并且公元前290年秦仍有宜阳,公元前289年秦才攻取河雍,宜阳、河雍两地都存在,说魏哀王二十四年(前295)“改宜阳曰河雍”似有误。又,公元前289年河雍已经属秦,公元前288

年赵国从魏国得到河阳,说明当时河阳、河雍也都存在,说河雍改为河阳,也前后矛盾,就《史记》所载,战国魏时原晋河阳未曾改名河雍,仍是河阳。可见,宜阳、河雍、河阳三者关系存疑。秦时,河阳邑当仍为河雍邑。

以上说明盟津在春秋初期已经形成盟邑,周王曾允诺给郑国,后属晋国,名为河阳邑;战国时期属魏国,或改名河雍邑,又属赵,又属秦,仍为河雍邑;到汉代,置为河阳县。不过,此河阳并非“天王狩于河阳”的河阳,“天王狩于河阳”的河阳具体指河阳践土(详下)。

《中国历史地图集》“宗周、成周附近”图、“春秋郑宋卫”图、“春秋晋秦·汾浍、南阳附近”图中有盟津、盟,不过盟在盟津北渡口东,盟约在今孟州市偏西南黄河北,盟津则约在今孟州市西南黄河北“春秋郑宋卫”图、“春秋晋秦·汾浍、南阳附近”图中盟津、盟、河阳为三地,河阳在盟津北渡口的西北部^{[23]17,20-21,23-24}。这也是说西周、春秋时有盟津、盟邑、河阳,不过盟津与盟邑、河阳不是一地。《中国历史地图集》“战国韩魏”图中,盟津名为孟津^{[23]33-34}。这也表明,盟津、盟、河阳是否为一地,还存在着不同观点,详细讨论在后盟津地望一节,此不赘述。

西周已置关隘,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也见有置关的记载,但未见有盟津置关的记载,直到汉末。如《周礼》卷四《地官司徒下》“司关”条“掌国货之节以联门市,司货贿之出入者,掌其治禁与其征廛,凡货不出于关者,举其货,罚其人;凡所达货贿者,则以节传出之。国凶札,则无关门之征。尤凡,凡四方之宾客叩关,则为之告,有外内之送令,则以节传出内之。”^{[24]155}说明周代国境置有关隘,境内似未曾置关。南宋王应麟《玉海》卷二四《周十二关》:“司关,疏:司关,总检校十二关所司。在国内下云:每关下士二人者,自在关门关闭。王畿千里,王城在中,面有五百里界首,面置三关,则亦十二关,故云关界上门也。”“记玉藻注:殷则关讥而不征。疏:王制是殷礼。”^{[25]413}这是说国境置有关门,早至殷商时期。当然,这是后人的注疏,说商代置关,存疑。但据《周礼》卷七《夏官司马》“司险”条“掌九州之图,以周知其山林川泽之阻,而达其道路。设国之五沟五涂,而树之林以为阻固,皆有守禁,而达其道路。国有故,则藩塞阻路而止行者,以其属守之,唯有节者达

之。”^{[24]311}则周时,境内在交通要路上设有类似国境关隘的设施。盟津作为黄河南北交通的重要渡口,应该有守禁机构。

总之,在汉末之前,盟津主要是作为一个黄河交通渡口,渡口北有市集,并一度形成过集镇,可能置有类似关隘的守禁机构,后发展为县。

(二) 汉末至宋元军事功能凸显

东汉末,盟津见有关都尉的记载,说明盟津置关,为盟津关。关都尉为秦始置,汉代沿设。如《汉书》卷六〇《杜周传》:“后(杜)业坐法免官,复为函谷关都尉。”^{[14]2678}秦、西汉不见盟津置关记载。有认为西汉初期津、关相关或相同^{[26]68}。但至少到东汉末,津关还是有所区分的,这种区别在唐代有明显记载,唐代关下有津,职官也不同。《后汉纪》卷二四《孝灵皇帝纪中》载:中平元年(184)三月戊申,“河南尹何进为大将军,帅师次于都亭,自函谷、伊阙、太谷、轘辕、盟津皆置都尉,备张角也”^{[27]474}。《后汉书》卷八《孝灵帝纪》载:中平元年(184)三月戊申,“以河南尹何进为大将军,将兵屯都亭。置八关都尉官”。注曰“八关谓函谷、广城、伊阙、大谷、轘辕、旋门、小平津、孟津也。”^{[6]348}何进设盟津等八关都尉,目的是防御和镇压张角农民起义军,盟津等关的军事性质明显。

魏晋南北朝时,有盟津、孟津、武济、孟津戍等名称。三国时盟津有小平津之称。《史记·夏本纪》所载“又东至于盟津”的“盟津”,《集解》:“(北魏阚骠)《十三州记》云‘河阳县在河上,即孟津’是也”。《正义》:“《括地志》云‘盟津,……《水经》云小平津,今云河阳津是也。’”^{[4]70-72}据《括地志》,三国时成书的《水经》载盟津为小平津。但如前所述,汉末设有小平津、孟津等关都尉,可见小平津与孟津不是同一关隘名。《水经注疏》卷五:

河水又东,迤平县故城北。守敬按:两汉县属河南,魏废,在今孟津县东。汉武帝元朔三年(前126),封济北贞王子刘遂为侯国,王莽之所谓治平矣,俗谓之小平也。守敬按《后汉书·灵帝纪》,中平元年(184)置八关都尉官。《注》小平津其一也。是汉已以俗称名津。又《曹真碑》阴有小平农都尉安定某,则小平在魏时更入金石文矣。有高祖讲武

场。会贞按《魏书·高祖纪》，太和二十年(496)九月，车驾阅武于小平津。《通鉴·齐明帝纪》称，魏主讲武于小平津。平县在河南，《注》言县有讲武场，则亦当在河南，故下另叙河北二城。而《怀庆府志》云，在下孟州河干，俗呼蜀王城，似误^{[28]3-4}。

可见，小平津在平县故城北黄河上，在清孟津县东。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卷四八《河南三》孟津县“小平城”条：

在今县西北。《旧志》云“汉平阴县城北有河津曰小平津，津上有城，灵帝时河南八关之一也。”袁绍诛宦官，中常侍张让等将帝步出穀门，至小平津，让等投河死，帝夜从小平津步至雒舍。雒舍在邙山之北，驿舍也。晋永嘉末傅祗保盟津小城，或曰即小平津。(东晋)建兴末(316)刘聪将赵固以洛阳归晋，聪遣刘粲以步骑十万屯小平津逼洛阳。(东晋)隆和元年(362)慕容暉遣其将吕护屯河阴，进攻洛阳，桓温遣军赴救，护退守小平津，中流矢而死。后魏(北魏)太和二十年(496)讲武于小平津。又(北魏)武泰初(528)尔朱荣举兵南向，胡太后遣费穆屯小平津拒之，穆遁还。《水经注》：“小平津亦曰河阳津。”^{[20]2250}

顾祖禹则认为小平津在明清孟津县城西北，即在今孟县西或西南方向。据《孟津县志》，平阴县城遗址在今孟津县白鹤乡白鹤村一带。白鹤乡已经改为白鹤镇，这样，小平津故址就在白鹤镇黄河南岸一带^{[29]598}。清《乾隆)孟县志》卷一下《地理上》载“县南渡口在县城南十八里，即古小平津，亦通谓之孟津。”^{[30]41}这是说小平津在孟县南18里，那是在今孟津县会盟镇新花园村一带了，与顾祖禹观点不同。《孟津县志》也是这种观点，认为小平津在老城乡花园村东北河道中：“西汉初分洛阳县北境置平县，王莽时改为治平县，东汉初复改为平县。汉灵帝于城北置小平津，列为环卫洛阳的八关之一。其位置在老城乡花园村东北河道中”^{[29]599}。花园村在老城乡东北，老城乡即会盟镇。这认为小平津置于平县城北，而不是平阴县城北。可见，顾祖禹是将平阴县城与平县城的位置颠倒了。《河南行政区划史》指出，春秋

平阴，周邑，战国时置县，治在今河南孟津县东；秦汉平阴县，东汉建安中(196—219)更名河阴，曹魏、西晋、汉、前赵、后赵、前燕、前秦、后秦、东晋因之，治在今河南孟津县北；北魏，河阴并入洛阳；东魏置河阴郡、县，治河阴县，北齐、北周因之，治今河南孟津县东；隋大业元年(605)废河阴县入洛阳县^{[31]62,87,118,133,146,158,161,173,182,197,204,242,269,311}。这是认为平阴县曾有迁徙，由今河南孟津县东迁至今河南孟津县北，又迁至今河南孟津县东，具体地点则不明。

三国时，盟津有陶河之称。《水经注》卷五《河水》：“又东过平县北，湛水从北来注之。”注云“河水于斯，有盟津之目。《论衡》曰：武王伐纣，……《尚书》所谓东至于孟津者也。又曰富平津。(东晋孙盛《晋阳秋》曰：杜预造河桥于富平津，所谓造舟为梁也。又谓之陶河。(三国)魏尚书仆射杜畿，以帝将幸许，试楼船，覆于陶河，谓此也。”^{[15]107}由此又可见，盟津在小平津之西。

西晋有盟津、孟津、富平津之名。如前引《附释音春秋左传注疏》卷四隐六年(前717)所载与郑人苏忿生之田十二邑中“盟”，西晋杜预注“今盟津”。东晋十六国时期，盟津的军事功能彰显，盟津置戍，为盟津戍。戍是一种军事性质的机构。《资治通鉴》卷九三《晋纪十五》东晋明帝太宁三年(325)五月条：“(前)赵主(刘)曜使中山王岳将兵万五千人趣孟津，……岳克孟津、石梁二戍，进围(后赵)石生于(洛阳)金墉。”元胡三省注：“此孟津戍，盖置于河阴；石梁戍在洛北。”^{[2]2936}不仅仅是军事要地，也是军事要道。崔鸿《十六国春秋·前秦录》曰：“(苻)健字建业，洪第三子也。……称晋征西大将军都督关西诸军事、雍州刺史。于是尽众西行至盟津，起浮桥以济，济讫焚桥。三辅堡壁悉降。十一月，入都长安，于是长史贾元硕等依诸葛亮、刘备故事，表健为秦王。”^{[32]20}据上引《晋阳秋》，盟津又称富平津。《晋书》亦有记载，《晋书》卷三四《杜预传》：

预又以孟津渡险，有覆没之患，请建河桥于富平津。议者以为殷周所都，历圣贤而不作者，必不可立故也。预曰：“‘造舟为梁’，则河桥之谓也。”及桥成，帝从百僚临会，举觞属预曰：“非君，此桥不立也。”对曰：“非陛下之明，臣亦不得施其微巧。”^{[33]1028}

这里,同时出现“孟津”与“富平津”,似乎是两个不同的津渡,但从后面的内容来看,又实指一处,就是盟津。这从唐时富平津、河阳关也可佐证。《新唐书》卷三八《地理志二》河南道河南府偃师县条“西北有故富平津、河阳故关。”^{[34] 982}

南北朝时,又有陶渚、武济、河阳关、河阳三城、河阳总管府、河阳镇等称名。前引《水经注》卷五《河水》注“又谓之曰陶河”,(熊)会贞按:“《魏书·孝庄帝纪》,车驾巡河,西至陶渚,又取此河以名渚耳。”^{[28] 6-7}东魏时置武济城、中潭城。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卷四八《河南三》孟津县“武济城”条“在旧县东。旧传周武王伐纣由此济河,故名。东魏筑城于此,为戍守处。周建德四年(575)大举伐齐,宇文宪拔武济,进围洛口,拔东西二城是也。”^{[20] 2250}武济、东西二城,这是指河阳三城中的南北城了。同书卷四九《河南四》怀庆府孟县黄河关条载“在县南黄河北岸。又县西南有河阳古关,宋白曰‘河阳关,东魏置于中潭城。’”^{[20] 2300}《太平御览》卷一六一《州郡部七·河北道上·孟州》:“《北齐书》曰:神武使潘岳镇北城,又使高永乐守南城,以备西魏;又东魏所筑中潭城仍置河阳关;故有河阳三城。”^{[35] 571}清《乾隆》孟县志》卷一下《地理上》载“乃及北岸二城,称为北中郎府者,盖北中郎府即河阳三城之北城。后魏太和十七年(493),迁洛命作河桥,河北侧岸有二城相对,置北中郎府戍守之。北中不守,则可平行至洛阳。酈道元《水经注》时止有此二城,若中潭城及南城则东魏元象间(538)所筑,道元歿于孝昌间(525—527),此又在其后十余年矣,故道元祇及北中城而不及中潭暨南城也。”^{[30] 33}可见,北齐时仍有河阳三城,仍置河阳关。这说明到东魏、北齐时,盟津建有三城,南城又称武济城,中潭城上设有关隘,称河阳关。只是《乾隆》孟县志》将河阳三城置于当时孟县西南35里的野戍镇黄河南北。后周置有河阳总管府、河阳镇等军事建制。《周书》卷一三《文闵明武宣诸子传》:“滕闻王逌,字尔固突。……(建德)六年(577),为行军总管,与齐王宪征稽胡。逌破其渠帅穆友等,斩首八千级。还,除河阳总管。”^{[36] 206}《北史》卷一〇《周本纪下》:“大象二年(580)九月丙戌,废河阳总管为镇,隶洛州。”^{[37] 383}

隋唐时期,有盟津、河阳津、河阳关、河阳宫、河阳三城、孟州等名。隋代,随着洛阳地位的提

高,洛阳所在河南地区关防显著加强,有盟津设置。(北朝《冀州图经》云“河阳,在河内郡南六十四里,有宫有关。”^{[38] 300}此又见《太平御览》卷一六一《州郡部七·河北道上·孟州》^{[35] 571}。“有宫有关”中的宫即河阳宫,关即河阳关。说明隋代还在河阳城建有河阳宫(详下)。《隋书》卷三〇《地理志中》河内郡河阳县:“旧废,开皇十六年(598)置。有盟津。有古河阳城治。”^{[39] 848}北齐天保七年(556)废河阳,隋开皇十六年复置,治今孟州市东南黄河岸边,非古河阴城^④。这认为隋代河阳城已有迁徙,似误。

唐代,盟津又有治戍津、河阳津等称名。如前引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一上《光武帝纪上》更始二年(公元24)所载李贤注,盟津俗名治戍津,为河阳县津。治戍津当为治戍津、野戍津。《乾隆》孟县志》卷一下《地理上》载“杜佑曰‘河清县临黄河。’《方輿纪要》曰‘城侧有野水渡,置戍守之,亦谓之野戍。’唐乾元二年(759),镇西兵自相州溃还,段秀实时为行营留后,屯怀,帅将士妻子、公私辎重自野戍渡河,待命于河清南岸,荔非元礼至而军焉。又史思明见军于河清,欲绝李光弼粮道,光弼军野水渡以备之,因降其将李日越于此。(旧《志》云‘野戍镇在今县西南三十里’似误。据此,野戍尚当在河阳北城之西,今此所言,特据俗所通称者,合并而言耳。”又载“野戍镇渡口,在县西南三十五里,即古孟津,又为盟津,又为武济津,又为富平津,又为古河阳渡。”^{[30] 33-34, 41}前条引自《读史方輿纪要》卷四九《河南四》怀庆府孟县“河清城”条,据顾祖禹,河清城在孟县西南50里,宋移治于白坡镇^{[20] 2299}。据《孟津县志》,“唐高祖武德时(618—626)置大基县,玄宗先天元年(712)因黄河水清,易名河清县,治在黄河北岸。今王良乡河清村,黄河北岸原有北河清村。宋太祖开宝初(968),河清县城自黄河北岸移至白坡镇(白鹤村)”^{[29] 599}。王良乡河清村今为孟津县小浪底镇,远在白鹤镇以西。可见,将河阳城与河清县联系在一起,以河阳城所在盟津为野戍津,似误。据前引《括地志》,盟津又称河阳津。

当然,在唐代受政治、军事形势影响,盟津、河阳关废置不常^[40]。唐初,洛阳所在河南道关防大量废弃。如武德九年所颁《废潼关以东缘河诸关不禁金银绫绮诏》云“其潼关以东缘河诸关,悉宜停废。其金银绫绮等杂物,依格不得出关者,并

不须禁。”^[41]卷一〇八、⁵⁶²高宗、武则天时期,洛阳地位的上升,甚至取代长安作为都城,关防得到加强。高宗显庆二年(657)十二月十九日洛州南面、北面各置关;天授二年(691)增设洛州南、东、北三面关防;随后撤销,到圣历元年(698),神都四面复置关防等,这都包括盟津、河阳关的变动。《元和郡县志》卷五载:河阳中潭城,天宝(742—755年)以前亦于上置关^[42]¹⁴⁴。

据《读史方輿纪要》卷四九《河南四》怀庆府“孟县”“河阳城”条所载,唐代河阳曾为盟州治,并置有河阳三城节度使、孟州,河阳三城包括北城、中潭城和南城;建中二年(781)设置河阳三城节度使,建中三年(782)移治河阳(详后)^[20]²²⁹⁸⁻²²⁹⁹。同书同卷怀庆府孟县:

中潭城,在今县西南黄河中央滩上。旧曰河中渚。《水经注》:“河中渚上有河平侯祠,河之南岸有一碑,题曰‘洛阳北界’。”中潭城盖在河中渚上,东魏元象元年(538)筑,历代为防拒之所。唐武德三年(620)贼帅李商胡据孟津中潭,为窦建德所灭。今废^[20]²²⁹⁹。

《唐代的州和道》载:

孟州:会昌三年(843),以河南府河阳县置。治河阳(今河南孟县)。约当今河南温县、孟县、济源、孟津南至黄河的地区。

河阳:建中二年(781)置河阳三城节度使,贞元初废,十二年(796)再置河阳怀节度使。亦名怀卫。治河阳(今河南孟县南)。领河阳三城、孟、怀、卫等州,约当今河南黄河以北,太行山以南,浚县以西及黄河南岸孟津、荥阳一部分^[43]^{24,102}。

说唐代孟州治所河阳为今河南孟县有误,据前所述,这是金代河阳迁徙后的治所。《河南行政区划史》对唐五代河阳的建制沿革情况也有具体介绍:

武德四年(621)河阳为盟州治,八年(625)废州,会昌三年(843)为孟州治;建中二年(781),在河阳县置河阳三城节度使(简称河阳节度使),辖怀州、郑州、汝州、陕州及河南府河阳、温、汜水、河清、济源五县,同年改辖怀州、卫州及

河阳、温、汜水、河清、济源五县,又称为怀卫节度使;贞元元年(785),降为河阳怀都团练使,所辖卫州分出;贞元五年移镇怀州,贞元十二年(796)复为河阳节度使,长庆元年(821)镇还治河阳,会昌三年(843)河阳又为孟州治,唐末镇辖孟、怀二州;五代,后梁一度增辖泽州,河阳治在今河南孟州市东南^[31]^{314-315,374,390}。

这是将河阳治置于今孟州市东南,与置于今孟州市南、孟津县东北的盟津略有不同^[31]²²⁻²³。《元史》卷五八《地理志一》:“孟州,下。唐置河阳军,又升孟州。”^[44]¹³⁶²

五代宋金时期仍有盟津,仍置河阳三城节度使、孟州,金代在盟津南渡口置孟津县。五代,《宋史》卷二六二《李涛传》:“晋天福初,改考功员外郎、史馆修撰。晋祖幸大梁,张从宾以盟津叛,陷洛阳,扼虎牢。”^[45]⁹⁰⁶⁰北宋,《全宋诗》卷二四八梅尧臣《送河东转运刘察院》:

塞郡屯师久,飞鸟始得人。权倾拥旄将,诏辍绣衣臣。旧里过京洛,辞家渡盟津。紫裘苏合染,骢马玉环辰。榆荚关头雨,梨花谷口春。高车方陟险,丰膳暂违亲。山势北临岱,地雄西隔秦。行台知不远,能使问安频^[46]²⁹¹⁴。

南宋,《宋史》卷四一二《孟珙传》:南宋端平元年(1234),“太常寺簿朱杨祖、看班祗候林拓朝八陵,谍云大元兵传宋来争河南府,哨已及盟津,陕府、潼关、河南皆增屯设伏,又闻淮阔刻日进师,众畏不前”^[45]¹²³⁷⁴。据《读史方輿纪要》卷四九《河南四》怀庆府孟县条,宋仍曰孟州,亦置三城节度使(详后)。

金代至明代置县,金代还一度置淘州。牛汝辰指出金代在孟津渡南口置孟津县^[17]⁹⁸。此见顾祖禹。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卷四八《河南三》“孟津旧县”条“在县东二十里。周武王伐纣,师渡孟津是也。汉为平阴县地,晋属河阴县,唐属河清县,宋亦为河清县地。金人徙置孟津县于此,明朝嘉靖中又徙今治,置孟津巡简(按‘简’当作‘检’)司于旧县治。《旧志》:县北去孟县三十里。”同书同卷“孟津县”条“宋移河清县治白坂镇。金徙治孟津渡,改孟津县,又升为淘州,州旋废。元仍曰孟津县。明朝嘉靖十七年(1538)圮

于水,二十五年(1546)始迁今治。”^{[20]2249}《元史》卷一四一《察罕帖木儿传》:“(至正)十五年(1355),贼锋。贼乃北渡盟津,焚掠至覃怀,河北震动。察罕帖木儿进战,大败之,余党栅河洲,歼之无遗类,河北遂定。”^{[44]3384}

但据《孟津县志》“孟津县城”条、“明、清孟津县城”条,元代时孟津县城也有过迁徙^{[29]598-599}。史念海《河山集二集》据嘉庆《清一统志》卷二〇六《河南府》也指出元代孟津县城有迁徙^{[47]140-141}。《河南行政区划史》将元代孟津县城治置于今孟津县东会盟镇新花园^{[31]444},此大致是盟津所在地,这也是认为元代孟津县城未曾迁徙。

(三) 明清时期的废弃

明清时期,盟津的废弃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盟津津渡的废弃,二是盟津所在地州县等设置的迁移。如前引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卷四八《河南三》“孟津县”条所载,孟津县“明朝嘉靖十七年(1538)圯于水,二十五年(1546)始迁今治”。《明史》卷四二《地理志三》河南河南府孟津县条“府东北。旧治在县东,今治本圣贤庄,嘉靖十四年七月迁于此。西北有大河。又西有碛石津,又西有委粟津,又有高渚、马渚、陶渚,皆大河津济处。东北有孟津巡检司。”^{[48]982}因元代孟津县治已经有过迁徙,所以明代于孟津县旧县治所设孟津巡检司也并非在原盟津南津渡处,是在其附近。清代时,盟津北渡口的河阳县治、河阳关已经废弃。《大清(乾隆)一统志》卷一六〇河南怀庆府“古迹”载“河阳故城,在孟县西三十五里。”^{[49]230}《读史方輿纪要》卷四九《河南四》怀庆府孟县黄河关条载“在县南黄河北岸。又县西南有河阳古关,宋白曰‘河阳关,东魏置于中潭城。’”^{[20]2300}

三、盟津的地望

盟津的地理位置,一般认为就在今河南省孟津县和孟州市。也有学者提出新观点,认为在风陵津,即今山西省运城市芮城县风陵渡镇风陵渡,而不是在孟津^[18]。朱圣钟对此新观点进行了驳论,认为此观点不成立,盟津就是孟县(今孟州市)西南部孟津^[50]。其实,吴郁芳观点之误,直接证据就不少。如前引《史记·夏本纪》所载“道河积石,至于龙门,南至华阴,东至砥柱,又东至于盟津”;《汉书·地理志上》所载“道河积石,至于龙门,南至于华阴,东至于底柱,又东至于盟津”,说明盟津在三门峡砥柱的东边。前引《汉书·沟洫志》

所载“唯是为务,故道河自积石,历龙门,南到华阴,东下底柱,及盟津、雒汭,至于大伾”,这是说盟津在黄河砥柱与洛汭之间,离洛汭不远。洛汭是洛河与黄河的交汇处。显而易见,这些都证明渭河入黄河处的黄河北岸的风陵津不是盟津所在地。

虽然一般都认为盟津的地理位置就在今河南省孟津县和孟州市,但具体来说,也有不同之处,其具体的地理位置并不明确。如《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认为盟津在今河南省孟县(今孟州市)西南黄河上^{[51]2692};牛汝辰认为盟津是古代洛阳东北黄河上的重要渡口^{[17]98};最近出版的《河南行政区划史》也说盟津“为古黄河渡口,在今河南省孟州市南、孟津县东北”^{[31]22-23,41};曾广开认为盟津“即孟津,在今河南省孟县之南,洛阳东北”^[52],这都是大致方位,并没有具体的地理位置。前引朱圣钟认为盟津就是孟县(今孟州市)西南部孟津,似乎说盟津只属于孟州市,至于西南部孟津的具体位置也没有说明。就是方位,孟州市南与西南是不同的;孟津县东北与洛阳市东北也是不同的;说古代洛阳东北,而古代洛阳城也是变动的,汉魏洛阳城与隋唐洛阳城就不是同处。一般认为盟津包括黄河南、北两岸的渡口,这是没有问题的^{[53]56},但就盟津而来的河阳三城来讲,盟津还应包括南北渡口间的中潭城所在的河中渚。

(一) 盟津南渡口地望

明确记载盟津地理位置的是前引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卷四八《河南三》“孟津旧县”条、“孟津县”条,说金代孟津县城就在盟津,西距明清孟津县城20里。

但据《孟津县志》“孟津县城”条、“明、清孟津县城”条,金代孟津县城迁至盟津(老城乡花园村东北),因水灾,到元代县治西迁5里至永安堤(老城乡小集村北),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又西迁12里至太平庄(今老城)^{[29]598-599}。这里,盟津西距明清孟津县城17里。史念海《河山集二集》据嘉庆《清一统志》卷二〇六《河南府》指出“孟津这个地名,远在西周初年就已见于历史记载。但作为一个县城,却是在金时,当然还可以上溯到宋代的河清县。宋时县城在白坡镇,金移于古渡口桃花店西一里柳林,元代再往西移二里,到永安堤上,明中叶又往西移二十五里,就是现在的孟津老城”;明代为黄河溢水所圯的县城,“城移后改称旧县镇。今孟津老城东二十五里已在黄河的中

游,旧县镇当已淹没于水中。金时的旧县城更在其东一里,那里同样也已经成为洪流”^[47]140-141。这里,盟津则西距明清孟津县城 26 里。《河南行

政区划史》将元代孟津县治置于今孟津县东会盟镇新花园^[31]444,说明老花园村已经不存在了。这些都说明盟津南渡口的变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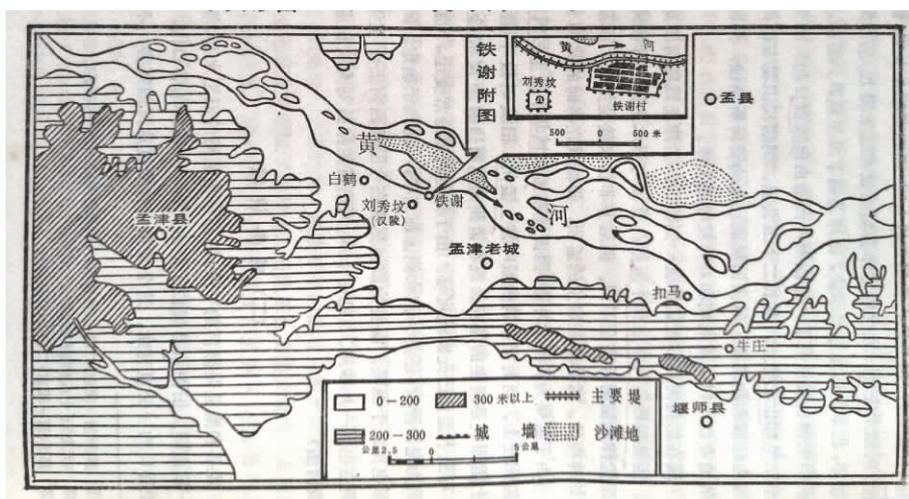


图1 孟津县刘秀坟和孟津老城黄河图^[47]144

又据前引《孟津县志》“孟津县城”条、“明、清孟津县城”条,金代孟津县城在今孟津县老城乡花园村东北,明清孟津县城在今孟津县城老城乡。1959年,孟津县治由老城迁长华(今孟津县城关镇),原所辖地称老城乡,1994年撤老城乡建立会盟镇,驻地在陆村,老城乡改为老城村,西距会盟镇 1 公里,西距县城 19 公里。据史念海,盟津南渡口在今孟津县东 64 里、老城村东 26 里左右的黄河中,具体在会盟镇原花园村东北的黄河中。《河南行政区划史》将元代孟津县城治置于今孟津县东会盟镇新花园^[31]444,新花园即新花园村,在花园村的东南,原花园村已为黄河河道,新花园村东南则是扣马村(图 2、3)。就是说原来的盟津已为黄河圯毁。杨冬晨认为盟津南渡口遗址“在今河南孟津县老城乡扣马村东南的邙山脚下。邙山的一个小土峰曾改名‘同盟山’,设祭的黄土台改为‘会盟台’,军队的驻地改名‘武济城’,遗址今仍存”(图 4)^[53]56-57。这是认为盟津南渡口在老城乡扣马村东南的邙山脚下的扣马村黄河边。扣马村得名周武王会盟伐纣时,商孤竹国君子伯夷、叔齐叩马而谏之地(图 5)。据村民说,实际上现在的扣马村因为黄河改道而迁徙过,现在的扣马村北距黄河约 3 里。扣马村应属于盟津附近之地,也非盟津的实际南渡口。这也说明盟津是一个区域,一个以盟津渡口发展演变的区域。

也有将盟津置于孟津黄河公路大桥西的渡口

村,即距离桥西数里的渡口村的黄河边,大致在今会盟镇北偏西的黄河边,“后来打听到了桥西的渡口村,据说地名极古老。驱车西行数里,在渡口村的村头和老人攀谈,得以确证这儿就是最早的那个孟津古渡。徒步北行 200 多米,攀上高高的堤岸,视野骤然开阔;河水远远地从黄土高原千里喧腾而来,出孟津渡后河宽水阔,这条大河就在眼前静静地、无声无息地流淌”^[54]。



图2 邙山(北)脚下的孟津县会盟镇扣马村(局部)

(二) 盟津北渡口地望

盟津在黄河上有南北渡口,这为学术界所肯定。以上说到盟津的南渡口。与南渡口的相关的孟津县的频繁迁徙不同^⑤,盟津的北渡口还与盟、河阳等名称变迁相关,复杂性突出。

1. “天王狩于河阳”的河阳与五种地望

如前所述,汉代之前的盟津北渡口先后为盟邑、河阳邑、或河雍邑、河阳县。《太平寰宇记》卷五二《河北道一》孟州河阳县:“以在河之北为名,



图3 扣马寨“长赢门”(背面)东侧“扣马”刻石
孟津县会盟镇扣马村



图4 当代·扣马寨“长赢门”内左侧会盟台碑
孟津县会盟镇扣马村



图5 明嘉靖八年(1529)·重迁古(伯)夷(叔)
齐祠碑记(碑阳)
孟津县会盟镇扣马村

属河内郡。今县西北三十五里有古城,即汉理所。《冀州图经》云:河阳在河内郡南六十四里,有宫阙,魏、晋如之。”^[21]⁴³⁷但河阳一名早见于前述“天王狩于河阳”。《春秋·僖公二十八年》:“冬,公会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陈子、莒子、邾人、秦人于温。天王狩于河阳。壬申,公朝于王所。”《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所载略同“冬,会于温,讨不服也。”“是会也,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壬申,公

朝于王所。”鲁僖公二十八年属春秋时期,为公元前632年。如前,《读史方舆纪要》认为此河阳就是先前的盟邑。王丰辨析了“天王狩于河阳”的河阳地望的四种观点:一在今原阳县,二在今荥阳市,三在今温县,四在今孟州市。他认为“‘天王狩于河阳’的地望就是今日的孟州市是比较合理的结论”,据《春秋》杜预注“晋山之南,河之北故曰南阳,亦即河阳”,河阳“大体指今天的太行山以南,黄河以北一带,包括当时的卫邑朝歌(今河南淇县)以西到原属于王畿的原、陘、阳樊等邑(均在今河南济源境内)”^[22]。就是说,当时河阳只是一个黄河之北的区域,而不是一个具体的专指性地名。而且“天王狩于河阳”的真正之地是河阳践土^[22]。实际上,王丰所梳理的几种观点清人已有所论。《水经注疏》卷五载:

河水又东,迳河阳县故城南。朱此十一字讹作《经》,戴改《注》,云:考河阳、临平、洛阳在平阴之东,平县之西,不得与《经》文淆紊。全、赵改《注》同。守敬按:两汉、魏晋、后魏,县并属河内郡,在今孟县西三十五里。《春秋经》书天王狩于河阳。……非温邑也。戴云:按河阳故城在今孟县西三十五里,温故城在今温县西南三十里,是以道元辨之。守敬按《汉志》《续汉志》并有河阳、温二县,郦氏盖因服、贾说,恐人误以为温即河阳,故此详引古籍,辨河阳与温各是一县。然春秋时,河阳为晋温邑之地,则举温可该河阳,是以下文又明服、贾言温之故。汉高帝六年,封陈涓为侯国,王莽之河亭也。《十三州志》曰:治河上,河,孟津河也。(东晋末)郭缘生《述征记》曰:践土,今冶坂城,是名异《春秋》焉,非也。朱治讹作治,下同。全、赵、戴改。赵云《魏书》作冶坂,亦作野坂。《宋书·王镇恶传》,索虏野坂戍主黑獬公游骑在芒上,是也。野、冶音同。戴云:考冶坂城,其下为冶坂津,在今孟县西南,而践土在今荥泽县西北王宫城之内,故道元辨其非。会贞按:践土有二,《春秋》僖二十八年(前632)五月,公会诸侯盟于践土。杜《注》,践土,郑地。《括地志》,荥泽县西北十五里有王宫城,《左

传》所云作王宫于践土者。又二十八年(前632)冬,天王狩于河阳。壬申,公朝于王所。《史记·周本纪》则云,晋文公召襄王,王会之河阳践土。《晋世家》亦云,壬申,文公率诸侯朝王于践土。《集解》引贾逵曰,践土,郑地名,在河内者。《索隐》引刘氏云“践土一在河南,一在河北”是也。惟以元城县西之践土驿当河北之践土,则太迂远矣。郭说践土,盖以目验得之。酈因治坂之名,与《春秋》之践土异,以郭为非,由不知河北之践土在此也。戴止知有河南之践土,故所说又失酈意。《寰宇记》,板城在河阳县西北三十五里,即此治坂城也,而又载践土城引《冀州图经》在县东七里,洛阳西北四十二里。分治坂、践土为二地,失之。今河北见者,河阳城故县也,在治坂西北,盖晋之湿地,故群儒有温之论矣。《魏土地记》曰:治坂城旧名汉祖渡,守敬按《史记·高祖本纪》,二年(前205),南渡平阴津。治坂在平阴东,相去不远。又《后汉书·光武帝纪》,更始元年(公元23),自洛阳北度河。建武元年(公元25)八月,幸河阳,十月,入洛阳,此正其济渡处也。城险固,南临孟津河。朱此下有“洛阳西北四十二里故邓乡矣”十二字,赵同,戴移入上卷末^{[28] P1-3}。

从注疏中可以看出,自古以来关于河阳或河阳践土的地望,观点不一。清人较为详细地梳理与辨析了“天王狩于河阳”中河阳的温县、滎泽县、河阳县、元城县等地望,认为践土在清代孟县治坂。这里还反映出河阳地望的第五种观点,即元城县(今河北大名县)。

从上引《水经注疏》可见,“天王狩于河阳”的河阳践土,即治坂城,又称汉祖渡;北魏时亦作野坂,置野坂戍,治坂城下有治坂津,西距平阴津不远。从中亦知,践土的具体地址也是有争议的。《水经注》认为践土在治坂西北,《太平寰宇记》将治坂与践土作为两地,践土在当时河阳县(治坂城)西北35里;清人郭守敬等认为在当时孟县西35里;今人有认为践土城即今孟州市槐树乡顺涧湖古周城^[22]等。如《读史方輿纪要》卷四九《河

南四》怀庆府孟县“治坂津”条:

在县东南四十三里。郭缘生《述记》:治坂城,春秋践土也。《水经注》:河阳故城,在治坂西北。《魏土地记》:治坂城,旧名汉祖渡,城险固,南临孟津。刘宋景平元年(423),魏主嗣寇河南,还至孟津,于粟磾造河桥于治坂津。魏主遂引兵北济,西如河内。元嘉七年(430),宋人复取河南地,魏遣安颀击到彦之,彦之遣裨将姚耸夫渡河攻治坂,与颀战,败绩于此。旧《志》:治坂津,在洛阳东北四十二里^{[20] 2300}。

这里,顾祖禹将治坂城写作治坂城,治坂城则在当时孟县东南43里。清《乾隆》孟县志》认为“东南”是“西南”之误^{[30] 29},并将治坂置于当时孟县白坡村,在县西南45里。清《乾隆》孟县志》卷一下《地理上·关津》载“白坡村渡口,在县西南四十五里,又名汉王渡,即古汉祖渡,又为古邓津,又为治坂津,又为灃陂津,亦通谓之孟津。”^{[30] 41}同书同卷《地理上·山川》载“而白坡即治坂,治坂即古邓乡矣。抑河南岸又有一白坡与河北岸白坡相对。”^{[30] 41}不过,清《乾隆》孟县志》认为治坂并非践土,践土在野戍镇西30里^{[30] 33}。史念海指出宋代河清县城在白坡镇,“现在白坡镇还在孟津老城西黄河岸上(今图作白鹤,是因为北岸也有一个白坡镇而改称的)”^{[47] 141}。黄河北白坡今属洛阳吉利区白坡,黄河南白坡今属于孟津县白鹤镇白鹤村。

2. 盟津北渡口的具体地望

《读史方輿纪要》认为“天王狩于河阳”的河阳就是先前的盟津北渡口处的盟邑,后晋国改盟邑为河阳邑。当时盟津为周武王会盟诸侯讨伐商纣之地,地名显赫,名震中外,若天王狩于盟津北盟邑,不至于改称为河阳或河阳践土,两者应非一地。既然“天王狩于河阳”的河阳实为河阳践土,那为何一个区域名称河阳却成为盟津北盟邑的又一专指性名称呢?

河阳邑专名的出现当在“天王狩于河阳”事件之后,与盟津一样,也是因事件得名。盟津的盟邑改称河阳邑是在春秋晋国时,晋文公是在“尊王”的旗帜下会盟诸侯,“一方面以显示自己拥有召唤天子的权威,显示自己在‘尊王’旗帜下的霸气,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达到控制周天子,以便随时

‘挟天子以令诸侯’”^[22]。就是说晋文公事实上是胁迫周王以号令诸侯,进而树立自己权威和霸主地位。晋国为纪念这一重要事件而将盟邑改名河阳是可能的,因这一事件有违君臣之礼,并为时人议论,所以晋国不便直接将“天王狩于河阳”的河阳践土易名河阳,而是将发生过类似事件的盟津之会而来的盟邑称名为河阳。后来,三家分晋的魏国继承河阳,或改名河雍,可能也有着当时政治上的考量。

后人往往将盟邑而来的河阳作为“天王狩于河阳”的河阳践土,两地地望误为一处。如前引《读史方輿纪要》。不过,还有两种情况,一是认为盟津与河阳为两地,就是说河阳并非置于盟津之地,两地地点是不同的,不能以河阳地点来判定盟津地点;二是认为盟津与河阳是一体的,河阳只是盟津北渡口,孟津县故城是盟津的南渡口,能以河阳地址来确定盟津地址。就是说,河阳是否就是盟津所在地是存在不同观点的。

其一,与盟津为两地的河阳。

与盟津为两地的河阳,如前引史念海《中国历史地图册》“春秋郑宋卫”图、“春秋晋秦·汾浍、南阳附近”图中盟津、盟、河阳为三地,河阳在盟津北渡口的西北部,盟津与河阳不在一处。又如《孟津县志》河阳三城:

北魏建。一为北城,在黄河北岸(吉利区冶成镇);一为中潭城,在黄河夹滩(雷家滩)中,已没于河;一为南城,在白鹤乡牛庄村。北魏、唐、宋以河阳三城为洛阳咽喉,置三城节度使镇守,故亦称河阳关。

1984年文物普查时,在白鹤乡于家村发现排鼓上写有“古南城”三字。老于家村已没于河,这是个新发现。据北城位置与老于家村恰成东南向斜线,而牛庄村位置在北城西南向,似不可逆水连城。清《孟津县志》、民国《乾隆孟县志》(稿)所记三城位置有误^{[29] 601}。

这是将河阳大致置于今孟津县白鹤乡对面的黄河北白坡,为“天王狩于河阳”的河阳所在地,与盟津不是一处。前引《河南行政区划史》所载盟津与河阳,今孟州市西南与东南,从方位上来看也是两地。杭侃认为隋开皇十六年(596),河阳县治自野戍镇徙至今孟州市南15里^[55]。就是

说,隋代之前的河阳城在冶坂,隋代之后迁移到盟津北渡口,河阳城与盟津也是两地。

其二,与盟津一体的河阳。

盟津与河阳一体,主要见于《读史方輿纪要》和清《乾隆孟县志》。盟津就是后来的河阳关、河阳三城等地望。《读史方輿纪要》卷四九《河南四》怀庆府所载盟津及其后河阳沿革较为详细:

孟县,在府西南六十里。西南至河南府孟津县四十里。北至山西泽州一百九十里。周武王会诸侯于孟津,是也。亦曰盟津。《左传》隐十一年(前712):“王以盟与郑。”后属晋,为河阳。战国属魏,为垣雍地。汉为河阳县,属河内郡,高祖封陈滑为侯国。晋仍属河内郡,后魏因之。隋仍为河阳县,属怀州。唐武德四年(621)置盟州于此,八年(625)州废。显庆二年(657)改属河南府,建中三年(782)河阳三城节度使治焉。会昌三年(843)置孟州,治河阳县。宋仍曰孟州,亦置三城节度。金亦为孟州。元属怀庆路,明朝改州为县,以河阳县省入。

河阳城,旧城在今县西南三十里。春秋时晋之河阳邑。僖二十年(前640)“天王狩于河阳”是也。后属魏。《史记》:“赵惠文王十一年(前288),董叔与魏氏伐宋,得河阳于魏。”汉置县。建武初(公元前25)帝幸河阳。晋仍为河阳县。后魏因之。太和中(477—499)筑河阳城。北齐置河阳关。后周建德六年(577)灭齐,置河阳总管府,以地临河津,特为重镇。隋置河阳宫于城内。唐仍曰河阳县。刘昫曰:“河阳城临大河,长桥架水,古称设险。”乾元中(758—759)史思明再陷洛阳,太尉李光弼以重兵守河阳。及雍王平贼,留观军容使鱼朝恩守之。建中二年(781)遂以河阳为节镇。会昌中(841—846)中书门下因奏置孟州于此。《元丰志》云:“怀州南至河阳七十里,河阳东南至河阴百六十二里。金大定中(1161—1189),城为河水所坏,筑城徙治,土人谓之上孟州;兴定中(1217—1221)复治故城,土人谓之

下孟州。元初(1271)复治上孟州,即今治也。”^[20] 2298-2299

由此可见,顾祖禹虽将“天王狩于河阳”的河阳误认为先前的盟津北渡口处的盟邑,但认为河阳是盟津的延续,这从唐初盟州的设置上也见其渊源,那就是盟津。

实际上,还有更多证据表明盟津就是河阳三城所在地,河阳三城分置于盟津南北渡口和南北渡口间的河中洲,是盟津的延续与发展。如赞宁《宋高僧传》卷二六《唐晋州大梵寺代病师传》载:“释代病者,台州天台人也。……先是三城间多暴风雹,动伤苗稼雉堞,号为毒龙为之也。代病为诵密语,后经岁序都亡是患。盟津民立堂宇若生祠焉。”^[56] 669 这里说河阳就是盟津。《册府元龟》卷四一四《将帅部·赴援》载:

梁张存敬为右骑都将,唐光启中(885—887年),李罕之会晋军围张宗奭于盟津,太祖遣丁会、葛从周、存敬同往驰救。存敬引骑军先犯虜骑,诸军翼之,虜骑大败,乃解河桥之围。

牛存节为宣义军小将,唐文德元年夏,李罕之以并军围张宗奭于河阳,太祖遣存节率军赴之^[57] 4932。

这也是说盟津即河阳。同书卷三九六《将帅部·勇敢第三》:

郝廷玉者,骁勇善格斗,事太尉李光弼为帐中爱将。乾元中,史思明再陷雒阳,光弼拔东都之师保河阳。时三城壁垒不完,刍粮不支旬日,贼将安大清等军数万四面急攻。光弼惧势西犯河潼,极力保孟津以持其后,……繇是贼解中潭之围,信宿走去^[57] 4700-4701。

这同样说明盟津与河阳三城的一致性。再如《雍正)河南通志》卷七《山川上》:“绝流通道而桥梁设则河桥为天造之险(杜预建河桥于富平津,在今怀庆府孟县西南三十里),自周武渡孟津以迄后来河阳三城之隘,周齐抗衡所必出也。”^[58] 152 等等。这些都说明盟津是河阳三城所在地。

其三,盟津北渡口的具体地望。

从渡口的特征来说,盟津北渡口当在盟津南渡口的对面,但如前引《孟津县志》所载“河阳三城”所揭示的,虽说地望不对,但表明盟津南北渡

口这种对面并非直对面,再加上还有河中洲,盟津的这种南北中的位置绝非一条直线,是有曲度的。

从前面所论,河阳城在今孟州市南或偏南的黄河边。1991年12月,今孟州市城西7里的堤北头村西北角100米处发现了唐开元五年程最墓,该墓坐落在“北邙岭”的南麓,出土的《大唐故处士程君(最)墓志铭并序》反映出程最与夫人同葬于河阳北18里,其略云“惟君太极元年(712)六月九卒于私第。先口郭氏为礼去。开元五年(717)三月二日与薛夫人同葬建窆。唯夫人又德名彻乡,儻忽奄风尘之烛,与君之同葬河阳县北,平原岭山之礼也。一十八里。”^[59] 这揭示出唐代该墓与河阳城的相对位置,当时河阳城在该墓南18里左右,也就是大致在今孟州市南偏西18里左右的黄河边,已经在今天的黄河中了,河对面大致当孟津市新华园村一带。实际上,孟津县在盟津南渡口附近的迁徙也反映盟津是盟津渡口为中心的一个区域。

四、盟津的历史地位

盟津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盟津的历史地位,主要可从四个方面讲,一是军事上,二是交通上,三是关津史上,四是文化史上。

(一) 军事重地

盟津在军事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盟津北临黄河,俯控洛阳,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既是渡黄河北上的战略要地,也是渡黄河南下的战略重地。这从前述盟津演变中的关、城、戍、军府、河阳军、河阳镇等所在军事建制也可见一斑。彦春、沙丹对孟津关所在地的历代军事战争略有述及,认为盟津之地是历代兵争要地^[60]。严耕望对盟津在军事上的地位有精辟论述,他指出,唐代盟津“为兵家必争之地,天下有乱,常置重兵。隋及唐代前期,置关于中潭,曰河阳关。……洛阳为唐代潼关以东第一政治军事中心,惟藉黄河之阻,以绝河北藩镇之窥伺,而河阳为最近洛阳之大津渡处,故常置河阳节度使度使,统重兵以镇之,是以李吉甫称为‘都城之巨防’也”^[61] 132。

汉末军阀混战,盟津在军事上的重要性多有记载。《三国志·武帝纪》中载有曹操劝袁绍等抢占以孟津为重点的各个要地以平董卓之乱:

诸君听吾计,使勃海(即勃海太守袁绍)引河内之众临孟津,酸枣诸将守成皋,据敖仓,塞轘辕、大谷,全制其险;

使袁将军(即袁术)率南阳之军军丹、浙,入武关,以震三辅;皆高垒深壁,勿与战,益为疑兵,示天下形势,以顺殊逆,可立定也^{[62]7-8}。

曹丕《典论自序》中也有关东诸将占领孟津的记载“山东牧守……于是大兴义兵。……兖、豫之师,战于荥阳,河内之甲军于孟津。”^{[10]卷一,299}

两汉之际,刘秀在河北发展自己势力,并在孟津驻兵以防守刘玄兵力北上的攻击。《后汉书》卷一上《光武帝纪上》更始二年(公元24)载:

青犊、赤眉贼入函谷关,攻更始。光武乃遣邓禹率六裨将引兵而西,以乘更始、赤眉之乱。时更始使大司马朱鲋、舞阴王李轶等屯洛阳,光武亦令冯异守孟津以拒之^{[6]18}。

刘秀也是自盟津南下黄河取洛阳等地。东汉,在盟津置盟津关。津、关虽然都置于交通要道之处,但关还强调军事守备防卫功能。《后汉纪》卷二四《孝灵皇帝纪中》载:中平元年(184)三月戊申,“河南尹何进为大将军,帅师次于都亭。自函谷、[伊阙](关)、大谷、轘辕、盟津,皆置都尉,备张角也”^{[11]126}。《后汉书》卷八《孝灵帝纪》载:中平元年(184)三月戊申,“以河南尹何进为大将军,将兵屯都亭。置八关都尉官”。注曰:“八关谓函谷、广城、伊阙、大谷、轘辕、旋门、小平津、孟津也。”^{[6]348}何进设盟津等八关都尉,目的是防卫张角农民起义军,军事目的明确。东汉张衡(字平子)《东京赋》曰“盟津达其后,大谷通其前。”^{[63]67}张衡论及洛阳优越的地理位置,就是因为洛阳四边有盟津、大谷等重关可守。

东晋十六国时期,盟津置戍,成为一种军事性质的机构。东晋大兴元年(318),东晋与汉(前赵)在盟津争战。《太平御览》卷三一四《兵部四十五·突围》:

《晋书》曰:李矩将张支与刘焯战于盟津,矩进救之,使壮士三千泛舟迎支。贼临河列阵,作长钩以钩船,连战数日不得渡。夜遣部将格增济入支垒,与支选精骑千余,而杀所获牛马,焚烧器械,夜突围而出,奔武牢^{[35]804}。

李矩为东晋将领,刘粲为汉(前赵)将领。汉在盟津北边围困东晋张支,并沿河建有防御工程。《资治通鉴》卷九三《晋纪十五》明帝太宁三年

(325)五月条:“(前)赵主(刘)曜使中山王岳将兵万五千人趣孟津,……岳克孟津、石梁二戍,进围石生于金塘。”胡三省注“此孟津戍,盖置于河阴;石梁戍在洛北。”^{[2]2936}盟津南岸置戍。

南北朝时置河阳三城、河阳关、河阳总管府等。如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卷四八《河南三》“武济城”条“在旧县东。旧传周武王伐纣由此济河,故名。东魏筑城于此,为戍守处。周建德四年(575)大举伐齐,宇文宪拔武济,进围洛口,拔东西二城是也。”^{[20]2250}

唐安史之乱期间,唐军与安史叛军为争夺河阳三城多次鏖战。如前引《册府元龟》卷三九六《将帅部·勇敢第三》:“郝廷玉者,骁勇善格斗,事太尉李光弼为帐中爱将。乾元中,史思明再陷雒阳,光弼拔东都之师保河阳。时三城壁垒不完,刍粮不支旬日,贼将安大清等军数万四面急攻。光弼惧贼势西犯河潼,极力保孟津以倚其后,昼夜婴城血战不解,将士夷伤。……俄而贼党大败于河壖,廷玉擒贼将徐璜而还,繇是贼解中潭之围,信宿走去。”又如同书卷四一四《将帅部·赴援》:“梁张存敬为右骑都尉,唐光启中(885—887),李罕之会晋军围张宗奭于盟津,太祖遣丁会、葛从周、存敬同往驰救。存敬引骑军先犯虜骑,诸军翼之,虜骑大败,乃解河桥之围。”

五代宋金时,盟津仍然是军事要地。如前引《宋史》卷二六二《李涛传》所载后晋张从宾以盟津叛,陷洛阳《宋史》卷二六七《赵昌言传》所载北宋在盟津增屯兵防备辽兵南侵。对盟津的重要地位,曾巩《知河阳制》有精辟论述:

盟津冀豫之域,背河向洛。成皋之间,天下之重地也。山川之固,为国屏翰。分土而治,非文武之特,曷可以当选授哉?某以材进拔,阅试已孚。俾仍近班,往祇厥服。有生齿之众,属尔抚和;有连营之师,待尔绥辑。尚茂循良之效,庶宽西顾之忧^{[64]卷二六,399}。

盟津地理条件优越,位置险要,为“天下之重地”,具有重要军事战略地位。

(二) 交通要津

盟津的交通线路、地位,就唐代的情况,严耕望有较为详细的考论。他指出,盟津“渡桥而南,临拊洛京,在咫尺之间。渡桥而北,直北上天井关,趋上党、太原;东北经临清关,达邺城、燕、赵;

西北入轹关,至晋、绛,诚为中古时代南北交通之第一要津”^{[61]132}。盟津在古代交通上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图6)。

盟津是军队通行的必经之地。周武王伐商纣,就前后两次经盟津北上。《全后汉文》卷九二陈琳《为曹洪与魏太子书》:

不然,商、周何以不敌哉!昔鬼方聋昧,崇虎谗凶,殷辛暴虐,三者皆下科也。然高宗有三年之征,文王有退修之军,盟津有再驾之役,然后殪戎胜殷,有此武功^{[65]5}。

周武王灭商迁商鼎也是自盟津南下。《宋朝事实类苑》卷二〇《九鼎》:“或问曰:周武王迁商鼎,鼎在今汲郡,如何渡河耶?通曰:如颜率言,一鼎用九

万人,士卒师徒器械备具焉,详于时造舟为梁,越盟津而至洛,必矣。虽迁徙至河南而安置,未得所,故成王定鼎于郊,廓城也。”^{[66]244}魏晋时期,盟津的军事要道作用凸显。如后赵将领苻健就是帅军自盟津过黄河西进,夺取长安建立前秦。《太平御览》卷一二一《偏霸部五·苻健》:“崔鸿《十六国春秋·前秦录》曰:(苻)健字建业,洪第三子。……(东)晋永和六年(350),自称晋征西大将军、开府、都督关西诸军事、雍州刺史。于是尽众西行,至盟津,起浮桥以济,济论焚桥。三辅堡壁悉降。十一月,入都长安,于是左长史贾玄硕等依昭烈称汉中王故事,表健为秦王。”^{[35]2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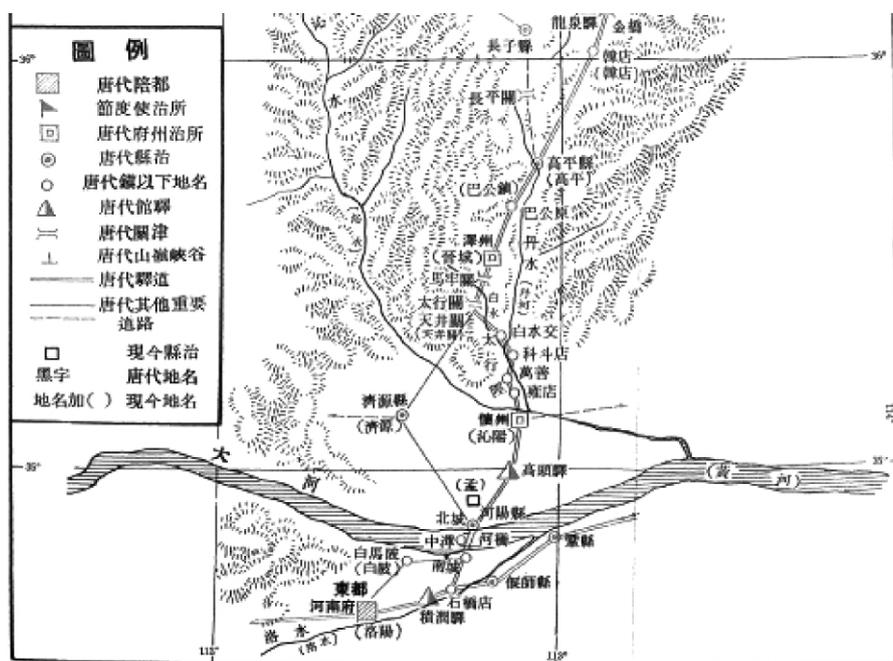


图6 《唐代洛阳太原道驿程图》(局部)^{[61](图四)}

除作为军事要道,盟津还是黄河南北重要通道。这是东周时周王自盟津过黄河北上晋国。《通鉴》卷一四九南朝梁武帝普通元年(520)八月条载“元略亡抵故人河内司马始宾,始宾与略缚获夜渡孟津,诣屯留栗发光家”,“元略乃魏相州刺史中山文庄王(元)熙之弟,为给事黄门侍郎,元熙为侍中、领军将军元义所杀,究治其党,略避祸”^{[2]4658-4659}。元略为避祸,自洛阳夜渡孟津逃至屯留。《隋书》卷三二《经籍志》云“后魏之末,齐神武(高欢)执政,自洛阳徙(《石经》)于邺都,

行至河阳,值岸崩,遂没于水,其得至邺者,不盈太半。”^{[39]947}这《石经》是经河阳(盟津)北上邺都的。《遗山集》卷一《送钦叔内翰并寄刘达卿郎中白文举编修》五首之二:

六月渡盟津,十月行汜水。风涛脱沉舟,冰雪危堕指。孝子在中野,永念负甘旨。家贫亲已老,形瘵心欲死。古称季路孝,负米曾百里。顾作鲤与鲂,宁当怨赧尾。君归不可缓,献寿迫岁始。遥知慈母心,己为乌鹊喜^{[67]11}。

这是走盟津南下再至汜水的交通线路,诗人描绘了沿途风光。

盟津不仅是交通要津,还是黄河交通桥梁,水上楼船建造、试验之地,在桥梁建设史上也具有重要地位。如前引《晋阳秋》所载杜预曾在盟津用舟船造河桥,即造舟为梁;崔鸿《十六国春秋·前秦录》所载苻健在盟津起浮桥以济黄河,也是造舟为梁过黄河;《水经注》卷五《河水》所载三国魏尚书仆射杜畿曾在盟津测试楼船。又如《北史》卷二三《于栗磾》:

洛阳虽历代所都,实为边界,栗磾劳来安集,甚得百姓心。(北魏)明元南幸盟津,谓栗磾曰:“河可桥乎?”栗磾曰:“杜预造桥,遗事可想。”乃编大船,构桥于野坂。六军既济,帝深叹美之^[37] 838。

这是北魏时盟津舟桥的建造,只是误将盟津置于野坂(冶坂)。前引《雍正》河南通志》卷七《山川上》所载“绝流通道而桥梁设则河桥为天造之险(杜预建河桥于富平津,在今怀庆府孟县西南三十里),自周武渡孟津以迄后来河阳三城之隘,周齐抗衡所必出也”,肯定了盟津上河桥建设的重要地位。

盟津旁有舟楫停泊港或水埠。《读史方輿纪要》卷四九《河南四》怀庆府孟县黄河略云“在县西南三十里。南渡即河南孟津县。河广二里,亦曰富平津,亦曰陶渚,自古设险之所。太子贤曰‘孟津在河阳县南门外。’胡氏曰‘河内北有太行之险,南据河津之要。’光武初拜冯异为孟津将军,统魏郡、河内兵于河上一拒洛阳是也。又有万艘潭,在旧县治南,潭水深平,为舟楫辏泊之所。”^[20] 2300

当然,盟津还是物资、漕运集散地。

(三) 盟津是天津发展史上的典型代表

盟津发展演变的历史全面反映了我国古代天津产生、发展和演变的历程与特征。前引《读史方輿纪要》卷四九《河南四》怀庆府所载盟津及其后河阳沿革较为详细,结合前面论述,可以说盟津具有四大特征:一是悠久性。盟津的产生远至夏代以前。二是全面性。盟津的变迁包括了天津发展演变的整个过程,从津渡到市集、城邑、县、戍、关津、军府、州府、节度使,再到关津、镇戍、行政区划的废弃迁徙,乃至实地于黄河的湮没消失等,揭示出中国古代天津变迁的复杂而完整的历程。三是开创性。盟津舟桥是大河桥梁建设的先导。如

唐代盟津浮桥因河水分南北二流,故桥也为南北两桥,以“船为脚,竹亘之”^[42] 卷五,144,置木工10人,水手250人^[68] 卷七,144,以资维修;此桥规制宏壮,为当时第一大桥,连锁三城,为南北交通之枢纽^[61] 131-132。四是标志性。盟津反映黄河不同河段的分界特征。《元史》卷一七〇《尚文传》:“长河万里西来,其势湍猛,至盟津而下,地平土疏,移徙不常,失禹故道,为中国患,不知几千百年矣。”^[44] 3987黄河河段的不同特征,在这里反映出来。

(四) 盟津也是文学创作的素材

盟津之会成为历代联合各方力量改朝换代的典故,也揭示出人心向背与国家兴亡间的攸关关系。如《旧唐书》卷五三《李密传》载:

(李)密复下回洛仓而据之,大修营堑,以逼东都,仍作书以移郡县曰:……今者顺人将革,先天不违,大誓孟津,陈命景亳,三千列国,八百诸侯,不谋而同辞,不召而自至。轰轰隐隐,如霆如雷,彪虎啸而谷风生,应龙骧而景云起。我魏公聪明神武,齐圣广渊,总七德而在躬,包九功而挺出。……

及义旗建,密负其强盛,欲自为盟主,乃致书呼高祖为兄,请合从以灭隋,大略云欲与高祖为盟津之会,殪商辛于牧野,执子婴于咸阳,其旨以弑后主执代王为意。^[69] 2212,2216,2220

又如《全唐诗》卷六四七胡曾《孟津》:“秋风飒飒孟津头,立马沙边看水流。见说武王东渡日,戎衣曾此叱阳侯。”^[70] 7432再如蒙古国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卷九《和吕飞卿》:“一试戎衣大定初,达贤不得退闲居。盟津既渡诸侯喜,亲见王舟跃白鱼。”^[71] 137《国朝诗话》卷一吴符奇《题画册褒姒举烽》云“烽火儿嬉事可哀,西周宗社陡成灰。方知八百盟津会,只直骊山一笑来。”

盟津是文学创作的素材。东汉末曹操《蒿里行》诗云“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踳踳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虱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72] 4曾广开认为该诗实际上是曹操所构想的讨伐董卓的作战方略的艺术再现,是写实而非用典^[53]。《文选》卷三张衡(张平子)《东京赋》亦云“审曲面势,溯洛背

河,左伊右瀍。西阻九阿,东门于旋。盟津达其后,太谷通其前。回行道乎伊阙,邪径捷乎鞶鞶。大室作镇,揭以熊耳。底柱缀流,饬以大岬。”^[63]⁶⁷又如曹丕《孟津》:

良辰启初节,高会构欢娱。通天拂景云,俯临四达衢。

羽爵浮象樽,珍膳盈豆区。清歌发妙曲,乐正奏笙竽。

曜灵忽西迈,炎烛继望舒。翌日浮黄河,长驱旋邺都。^[10]⁴⁵⁰⁻⁴⁵¹。

该诗作于建安二十一年(216)曹丕随征汉中张鲁胜利凯旋途中的孟津,反映曹操军队准备渡过孟津返回邺都前夕在孟津短暂停留时所举办的庆祝胜利的歌舞宴会盛况。韦庄《自孟津舟西上雨中作》:“秋烟漠漠雨蒙蒙,不卷征帆任晚风。百口寄安沧海上,一身逃难绿林中。来时楚岸杨花白,去日隋堤蓼穗红。却到故园翻似客,归心迢递秣陵东。”^[70]^{卷六九七,1304}明蒋一葵《尧山堂外纪》卷四一载五代南唐江文蔚《土牛赋》云“饮渚俄临,讶盟津之捧塞;度关恍许,疑函谷之九封。”

盟津也是黄河上关津通称、黄河段特称。清乾隆《乾隆孟县志》卷一下《地理上》载“县南渡口在县城南十八里,即古小平津,亦通谓之孟津。”^[30]⁴¹又前引同书同卷载“白坡村渡口,在县西南四十五里,又名汉王渡,即古汉祖渡,又为古邓津,又为冶坂津,又为灞陂津,亦通谓之孟津。”盟津成为孟津一段黄河上津渡泛称。同时,孟津也成为盟津所在一段黄河特称。如《乐府诗集》卷第二五《折杨柳歌辞五曲》之四“遥看孟津河,杨柳郁娑娑。我是虏家儿,不解汉儿歌。”^[73]³⁷⁰又如《全唐诗》卷一八二王维《杂诗三首》之一:“家住孟津河,门对孟津口。常有江南船,寄书家中否。”^[70]¹³⁰⁴

注释:

- ① 现有盟津的研究,主要在盟津的得名与地望方面,成果见参考文献[5][16][18][50]等。
- ② 《后汉书·明帝纪》有误,应该是《后汉书·光武帝纪》。参见[6](P18)。
- ③ 赵炳清等认为战国时垣雍为春秋时的衡雍,治在今河南省原阳县西,《中国历史地图集》也是将垣雍置于今原阳县西。分别参见[31](P55)、[23](P33-34)。
- ④ [31](P266)。《河南行政区划史》指出,春秋平阴,周邑,战国时置县,治在今河南孟津县东;秦汉平阴县,东汉建安中(196—219年)更名河阴,曹魏、西晋、汉、前赵、后赵、前燕、前秦、后秦、东晋,治在今河南孟津县北;北魏,河阴并入洛阳;东魏置河阴郡、县,治河阴县,

北齐、北周因之,治今河南孟津县东;隋大业元年(605)废河阴县入洛阳县。《读史方輿纪要》置古河阴城(平阴城)于当时孟津县东1里。《孟津县志》置河阴城遗址在孟津县白鹤乡白鹤村一带(白鹤镇)。分别参见[31](P62,87,118,133,146,158,161,173,182,197,204,242,269,311)、[20](P2249-2250)、[29](P598-599)。

- ⑤ 《孟津县志》说“孟津县历代曾九易其称,十三次徙治”。参见[29](P598)。

参考文献:

- [1] 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
- [2] 司马光.资治通鉴[M].胡三省音注.北京:中华书局,1956.
- [3] 陈戍国.尚书校注[M].长沙:岳麓书社,2004.
- [4] 司马迁.史记[M].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59.
- [5] 王树民.孟津[J].禹贡,1935(10):27-28.
- [6] 范晔.后汉书[M].李贤,等注.北京:中华书局,1965.
- [7] 许匡一.淮南子全译[M].刘安,等著.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
- [8] 黄晖.论衡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0.
- [9] 谷梁赤撰,范宁注,杨士勋疏.春秋谷梁传注疏[M].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80.
- [10] 易健贤.魏文帝全集全译[M].曹丕,著.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
- [11] 周天游.后汉纪校注[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
- [12] 马世之.中原古国历史与文化[M].郑州:大象出版社,1998.
- [13] 钟兆华.尉繚子校注[M].郑州:中州书画社,1982.
- [14] 班固.汉书[M].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
- [15] 陈桥驿,叶光庭,叶扬.水经注全译[M].郦道元,著.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
- [16] 童书业.“盟津”补证[J].禹贡,1936(2):22.
- [17] 牛汝辰.中国地名由来词典[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
- [18] 吴郁芳.盟津地望新探[J].考古与文物,1993(1):102-104.
- [19] 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M].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80.
- [20] 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M].贺次君,施和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5.
- [21] 乐史.太平寰宇记[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469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 [22] 王丰.“天王狩于河阳”地望考[J].史学月刊,2005(7):119-121.
- [23] 中国历史地图集编辑组编.中国历史地图集[M].第一册原始社会 商 西周 春秋 战国时期.北京:中国地图学社,1975.

- [24] 林尹.周礼今注今译(第三版)[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
- [25] 王应麟.玉海[M].四库全书本第943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 [26] 杨建.西汉初期津关制度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 [27] 袁宏.后汉纪[M].张烈点校.两汉纪.北京:中华书局,2002.
- [28] 酈道元撰,杨守敬纂疏,熊会贞参疏.水经注疏[M].第1函第3册.线装本.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
- [29] 孟津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孟津县志[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
- [30] 冯敏昌纂,仇汝瑚修.(乾隆)孟县志[M].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刊本//河南地方志办公室编纂.河南历代方志集成·焦作卷22.郑州:大象出版社影印,2017.
- [31] 赵炳清,伍小琴,张祥云.河南行政区划史[M].郑州:大象出版社,2020.
- [32] 崔鸿.十六国春秋[M].丛书集成初编第3815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 [33] 唐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34]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35] 李昉,等.太平御览[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94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 [36] 令狐德棻,等.周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1.
- [37] 李延寿.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38] 王谟.汉唐地理书抄[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61.
- [39] 魏征,等.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 [40] 陈习刚.论武则天时期天津的职能及其兴废[J].中州学刊,2007(5):168-171.
- [41] 宋敏求.唐大诏令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 [42] 李吉甫.元和郡县志[M].贺次君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
- [43] 程志,韩滨娜.唐代的州和道[M].西安:三秦出版社,1987.
- [44] 宋濂,等.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
- [45] 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46] 傅璇琮,等.全宋诗[M].第五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 [47] 史念海.河山集二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
- [48] 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49] 和珅,等.钦定大清(乾隆)一统志[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477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 [50] 朱圣钟.盟津地望再探:与吴郁芳同志商榷[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3):109-112.
- [51] 史为乐.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 [52] 曾广开.诗人以诗为史 后人以史说诗:关于“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诗句的商榷[J].许昌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1):67-68.
- [53] 杨冬晨.周公旦与西周礼治文明[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0.
- [54] 许晖.从孟津渡到羊肠坂[J].中州今古,2004(3):58-59.
- [55] 杭侃.孟州城址所反映的问题[J].中原文物,2001(3):55-57,77.
- [56] 赞宁.宋高僧传[M].范祥雍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
- [57] 王钦若,等.册府元龟[M].北京:中华书局,1960.
- [58] 田文镜等修,孙灏等纂.(雍正)河南通志(一)[M]//河南省地方志办编纂.河南历代方志集成·省志卷10.雍正十三年(1735)刻本.郑州:大象出版社影印,2016.
- [59] 焦作市文物工作队,孟县博物馆.河南孟县堤北头唐代程最墓发掘简报[J].中原文物,1995(4):28-35.
- [60] 彦春,沙丹.险扼古渡孟津关[J].军事历史,1995(5):52-53.
- [61]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M].第一卷 京都关内区.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
- [62] 陈寿.三国志[M].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1959.
- [63] 萧统.文选[M].李善注.长沙:岳麓书社,2002.
- [64] 曾巩.曾巩集[M].陈杏珍、晁继周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
- [65] 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C].第3函第23册.线装本.王毓藻校刊.清光绪二十年(1894).
- [66] 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 [67] 元好问.遗山集[C].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91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 [68] 李林甫,等.唐六典[M].陈仲夫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4.
- [69] 刘昉,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70] 彭定求,等.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60.
- [71] 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C].丛书集成初编第2053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 [72] 曹操.曹操集[C].北京:中华书局,1959.
- [73] 郭茂倩.乐府诗集[C].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

(责任编辑:汪文敏)